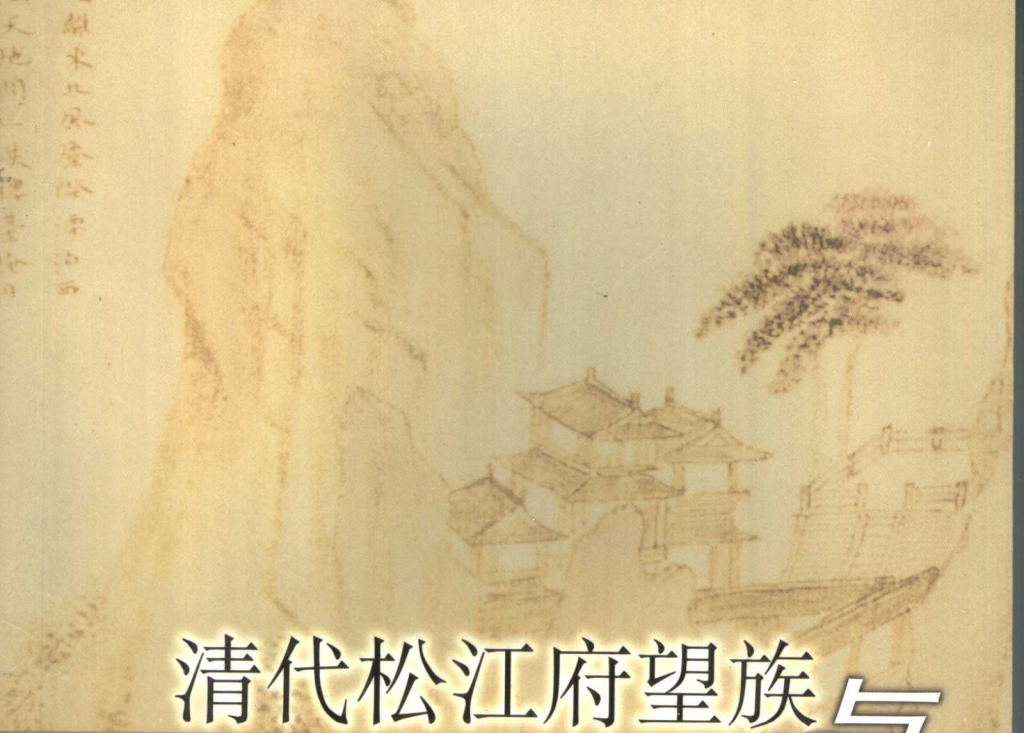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 文学研究

朱丽霞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 文学研究

朱丽霞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朱丽霞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25-4502-4

I. 清... II. 朱... III. ①家族—研究—松江区—清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松江区—清代
IV. ①K820.9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280 号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

朱丽霞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6 字数 300,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502-4
K·898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朱丽霞

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家族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目前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明清江南家族文化、家族文学研究等方面。已出版专著《清代辛稼轩接受史》（45万字，齐鲁书社）。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文章及学术论文40余篇。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



明代松江府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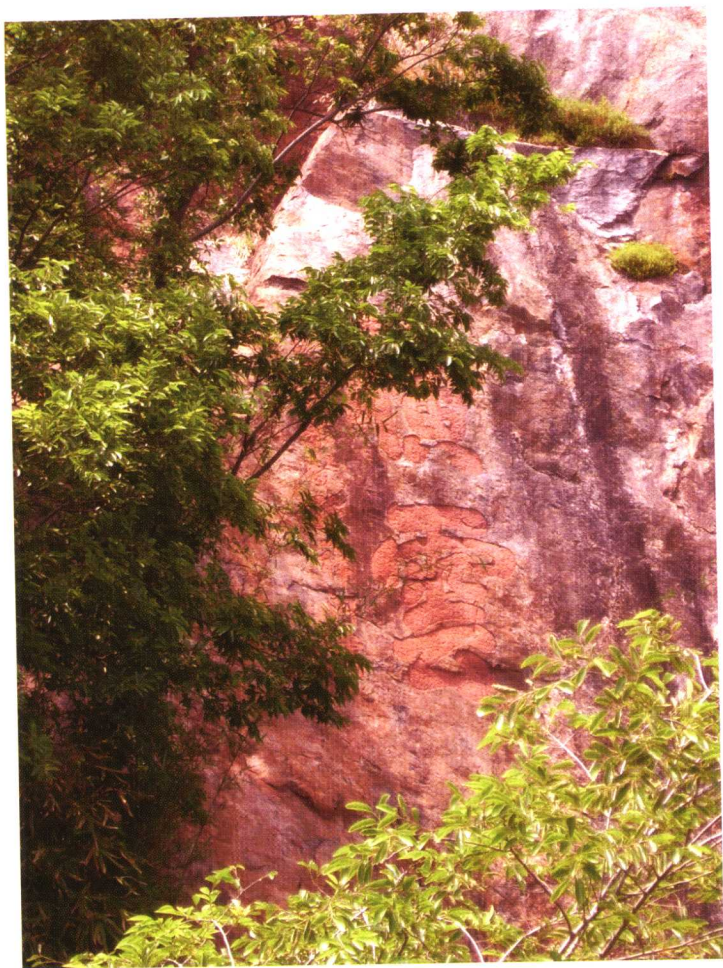


清代松江府地图



【横云山】

横云山庄，为明季几社名士李雯之父李工部逢甲别墅。环山临水，嘉树扶疏，高阁重堂，丹楹刻桷，园林之胜，冠绝一时，成为晚明文人雅集的圣地。李雯《横云山家宴》：“露白云高秋月明，开樽相见数峰清。将雏不厌青桐树，下食应餐紫桂英。坐上金风吹玉律，灯前牙拨殿银箏。楼台永夜常如昼，不用萱苏慰曲情。”明清之际，横云山成为陈子龙、夏允彝、宋徵璧、宋徵舆等几社文士聚会之所。李雯歿后，横云山庄成为著名隐士诸乾一别墅。吴梅村《横云》：“青嶂千金凿，丹楼百尺高。空山开化迹，异代接贤豪。”周茂源《乾一招饮横云山雪堂分文字》：“图画山川羨少文，至今衣袂绕烟云。人来白社频中圣，坐爱萧斋见此君。芳草露痕双屐破，落花风色片帆分。酒阑有客舒长啸，惊起前滩鹤几群。”清初，横云山庄又为户部尚书——横云山人王鸿绪所购得，并在原有园林基础上增建宜园等新景点。后经动乱，山庄尽毁。



【横云】

透过横云山峭壁摩崖“横云”二字，犹可想见昔日以宋家兄弟、陈子龙、李雯为主体的几社名士山水游览的雅兴和诗酒唱和的高致。



【宋懋晋山水画】

宋懋晋，字明之，颖敏绝伦，雅善谈论，好吟咏题跋，殊工博物，格古赏鉴，被誉为“无声诗史”。书法一时称盛，绘画为董其昌所推重。诗以题画为多，如《题赵文度扇面小景》：“古木支离，枯藤夭矫。短棹孤帆，沧江野老。”《题自仿巨然画册》：“大夫群立尽参天，石壁苍苔不记年。偶遇导师传秘密，入山且做地行仙。”著有《宋明之稿》。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序

罗时进

从家族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是陈寅恪先生较早提出并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其《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指出:

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把这种研究思路引入文学研究,特别是以其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进路之一。这大大拓展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格局,出现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家族”的概念,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族大家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但同时也愿意指出,南朝以后,门第社会产生的“贵游文学”现象逐渐的消解过程,也是文化与文

学传播的过程,诚如杜佑《通典》卷一二八《州郡》所指出:“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文化和文学总体上话语权下移的同时,“新文化家族”又在逐渐形成并崛起。以吴地为例,《文选》卷二八陆机《吴趋行》中有“八族”、“四姓”之说:“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德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李善注引张勃《吴录》曰:“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时至明清,不仅唐代已趋衰落的“八族”风光不再,“四姓”中除顾氏外,也基本上失去了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明显优势。但随着新官僚阶层和科举世家的出现,文学乃至文化又出现了逐渐集中化的倾向。如松江宋氏、王氏,苏州惠氏、彭氏、叶氏、潘氏,虞山钱氏、翁氏、常州庄氏、恽氏、张氏,无锡顾氏(苏州亦有顾氏大族)、阳羨陈氏、储氏……都是一个个“集点”。这些新文化氏族,一部分有往代东迁南移的背景,一部分则是借助“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的特殊环境和科举氛围逐渐成长的。他们犹如一个个纽结,通过学术研究、文学交流、政治关联和家族通婚,构成了整体网络,连接了江南几代重要学人、文学家。他们一次次卷动起时代的学术文化风潮和文学艺术思潮,使江南广袤的大地显示出蓬勃的学术和文学生命力。

松江,“故吴之裔壤,负海枕江,土膏沃饶,风俗淳秀,其习尚已各有所宗。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名显,机、云以词学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陈继儒撰《松江府志》卷七)到明末清初,当陆氏逐渐隐退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底基颇大的精英阶层的出现,影响了该地域的社会文化结构,带动了云间文化的蔚然昌盛,使之成为一个科举大邦、学术大邦、文学大邦,在江南具有相当的典型意

义。几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回溯上海文化的形成过程的话,与其追远陆氏,还不如着眼清代松江这个特色鲜明的“文化部落”。

现在,朱丽霞博士对这一“文化部落”研究的厚重成果已经形成并即将出版了,她嘱我为其新著写个序言。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望在他人著作前赘言,但作为该书的第一个阅读者,对手中这部书稿的撰写过程以及与朱丽霞君相识的因缘,倒是很愿意说说的。2003年,朱丽霞君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即与我联系,希望从我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当看到推荐人是他的博士生导师陆坚先生时,我不由得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时游学杭州,向陆先生请益的情景。陆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缘此,这一学术任务对我来说就无可辞却了。其实教学相长,我之愿意担任朱丽霞君博士后课题的合作导师,还在于希望与比自己年轻的学者切磋一些学术问题。恰好当时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方获批准,我计划将“江南文化氏族”分“松”、“苏”、“常”、“镇”四府进行研究,而她的博士论文是《清代辛弃疾接受史》,自然于清代文学和文化背景有深刻了解。朱君入博士后流动站后,我便建议她来担当“松江府文化氏族与文学”部分的研究工作。两年在站时间,除了修改博士学位论文和参加博士生学术讨论活动以外,朱君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一课题上,其力甚勤,其思甚敏。陆游曾有诗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萧彦毓诗卷后》)如果说2005年她所提交的这份报告我尚能识其“妙处”的话,是因为我知道朱君是如何热爱学术,而在从事研究的“山程水驿”中,是如何的全身心投入!

从文化家族的视角研究文学发展,就清代江南地域来说工作量巨大且难度较高。朱君之论“松江”凡四章,其言“清代松江府望族文化生态”颇为详切,继以宋氏和王氏作为个案,选择堪称典

型,许多材料和结论都使人耳目一新。这些内容包括附录中的考论成果,对清代文学研究都是别开生面和具有启发意义的。这部著作能够很快出版,我深为之高兴。朱丽霞君学力、精力、毅力在青年学者中都很突出,我们有理由期待她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在学术事业前进中成为有力推手。

2006年4月30日序,时客座于台湾东吴大学

清初、江南与家族文学(代序)

胡晓明

朱丽霞博士的《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选取一地（松江）二姓（宋、王）为对象，力图在广阔背景下，以江南积蓄深厚的家族文学为个案，为一个剧变时代提供文化面影、人物精神、文学风貌的一幅解剖图。这样的工作，扎实而深入，是清代文化、文学研究中尚属薄弱而又亟待开拓的领域，其创获实多，有益史文。

受朱博士的引发，我这里谈的，是就文史之学的交叉点，具体地说，“清初”、“江南”、“家族”这三个关键词与文学研究的因缘，还有多少新题目可做，略述一二浅见。

首先，明清之际出产人物，而人物正是文学与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正如朱丽霞博士书中所描述的宋氏家族，有着那样不同的文人个性。清军下江南，松江府有陈子龙、夏完淳、李待问这样的英雄，而第一个打出“大清顺民”旗帜的则是宋氏家族。曾与几社英杰朝夕唱和的宋氏兄弟宋徵璧、宋徵舆的诗词文赋中，既了无故国之思，亦不见背友之愧。宋家晚辈如宋楚鸿、宋泰渊、宋祖年、宋河宗、宋汉鹭等，也都有不同的性格。其实在明清易代之际，人物确是相当复杂多元的。数以千计的诗人，数以万计的诗篇，那是一个远迈前代的作家群体，有的高蹈远游，有的抗争洒血，有的慷慨长歌，有的浅斟低唱，文人丰富多元的个性，遭遇着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多少歌哭无端的故事，实有待于更多更

具体的研究。上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名著《柳如是别传》的学术典范意义,还未能真正在文史研究领域受到重视。柳传看起来是写钱、柳、陈因缘,然而涉及到的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不下数十人之多。譬如:有于楼馆劫灰之中,“解作江南断肠句”的伤心人余怀、张岱,也有慨以当慷,白衣峨冠,抵抗至死的英雄豪士孙临、傅山、阎尔梅;有奇情壮怀、铁锁绕颈三圈、“血淋没趾,屹立如山”的大侠和尚函可,也有素称“开清第一功”,却又暗中保护了函可的大汉奸洪承畴;有写作像《长恨歌》那样兴亡苍凉之感的杜于皇,也有画西湖垂柳遭受剪伐、“好色中有大节”的陈老莲;有身在清营心在汉、抱恨而没的“贰臣”陈名夏,也有虽依附权贵、生活豪奢,然守死尽忠,大节岿岿的杨龙友;即以佳人名姝而言,闺塾师的黄皆令,侠义的王修微、马湘兰,烈女的葛嫩、李香君,以及兼美女名女神女侠女奇女为一身的柳如是。如此丰富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诗歌文学而存有生命的风姿,这是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瑰宝,眼下的工作远未致其曲折而尽其能事。

其次,“明清易代文化意象”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所谓“文化意象”,即后人的历史体验,后人不断投射的追忆、情感、思绪与理念,不断透过反省与忆念的经营而生发的意味。明清之际,山河破碎,国族沦亡,对于后人,不止是痛史、心结,不止是天地怒气与电光火石,也是历史象征与隐喻。或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或长歌当哭,激发种性,或文化反思,史实深扣,或旧史新说,义理重张,头绪繁多,不一而足。从南社的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到同光体诗人的陈散原、范肯堂、沈乙庵,从三四十年代孟森、钱穆、谢国桢、郭绍虞,到六七十年代钱穆、吴宓、陈寅恪、牟宗三,一直到21世纪初的施琅郑成功优劣论,意象多多,各自经营,其间既有时代与思想的面影,又有隐隐的心曲相通。这里仅以吴宓为例,他不仅在五六十年代长期诵读顾亭林、吴梅村以及其他明遗民诗,反

复在日记里记下读诗与时代相关的隐性证据,而且明确说出:“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1957年8月13日,《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6)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他从中吸收华夷之辩和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资源,如云:“翻读《后水浒传》完,凡四十回,明末清初陈忱著,盖伤明之亡,而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之忠义与闯、献作反比,以李俊之(受宋帝册封)王暹罗正射郑成功之据台湾,其不言徽宗之昏德,亦不诋斥高宗,但归罪于奸臣之误国殃民,正同顾亭林、吴梅村等之志事与立场也。”(1961年11月25日,《续编》第五册,三联书店,2006)深入发掘此一“史文脱嬗”的抒情\叙事传统,有益于明清诗文的意义再认,也有益于重建中国文学的阐释传统。

第三,江南文化与文学的意义值得重估。这本书以及近年来的江南文学研究都表明,江南不只是诗性的、美学的意义。我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数据:科举考试的数据。江南进士的数目且不说,这里只以考试“首选”(即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人数为据。根据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的《清代殿试、会试历科首选省份人数统计表》,从顺治丙戌(1646)至光绪甲辰(1904)二百多年间,江苏共出产状元等184人,浙江共出产状元等137人。两省相加的人数为321人,是直隶、顺天、河南三省相加的35人的近十倍。在这个数字对比中,背后是经济、文化条件以及高素质的人口质量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取代中原,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中心”这一概念的意义,上,可以问的问题,那是远远超过了诸如水软风轻感伤唯美这样浅碟子化的江南文化定义的。台湾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曾经深刻指出过:“中国文化亡于明亡之时。”但是在短短两百年

间,原先抵抗最为激烈、遗民人数最多的江南,竟然在文化上翻身而跃为“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不也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死而复苏、重新通过和平的抵抗和文明的重建而获得真正的征服者的身份么?这哪里是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女性化江南所能够说明的呢?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至少两点是预期的:一、江南的文化深度与高度可以得到确立。像王阳明、陈子龙、张煌言、张岱、徐谓、李贽、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袁枚、戴震、洪升、章学诚、王国维、陈三立、沈曾植等第一流的中国文化心灵,都是简单的唯美主义文化所不能定义的。二、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可以得到理解。既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那样的感性优美的文化传统,也有考据学朴学那样理性主义的传统;既有如王阳明、顾炎武等圣贤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传统,也有《梁祝》《白蛇传》那样深入人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既有非常个人、相当隐逸的追求,也有融入宇宙热情与参与造化的兴趣。我在多年前的《文化江南札记》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引用牟宗三的框架,提出心性理与才情气六字来把握中国文化结构,我们希望可以理解的是,江南文化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并非只有一种面貌、一个形象,唯其文化深厚,更显示出江南文化各种成分之间相互的张力。因而,江南文化的丰富性是一口至今也没有穷尽的深井。

第四,家族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家族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年来我看到譬如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与文学》、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严迪昌《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以及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论著或博士论文,稍能扭转多年来仅偏于经济与社会史的家族文化研究取向,从学术与门风、家族信仰与文学成就,社会交往与时代文学主张与倾向等多方面探索了世家望族

对于文学史的重大意义。在师友结纳、文人社群、政治集团之外,找到了文学创作另一种共同体力量。表明了传统中国除个人生命情意而外,文学生活得以延续的另一番真实环境。他们都高度重视陈寅恪先生关于“世家文化依赖于地域”、“其核心是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两者影响甚至决定着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这一思想,将社会史地域史与写作史联系考察。从一个最大众的意义上说,这样的成果已经或正在改变五四新文化过于重个人而轻社会,而形成的一个偏见,即所有的家族文化都是万恶之源,都是束缚与扼杀人的性情,压抑人的个性与自由,因而都是不道德无益于社会,应是打倒之列。这样的工作当然还可以继续从量的积累做下去,一件件个案地整理挖掘,进一步发现中国家族文学悠久而广大的真相,从而重新书写既有时间延续(门风)又有空间置根(地域),时空结合的中国文学新史。但是我还是认为在综观的史识和微观的史述方面,仍有可做之事。譬如:南北比较(为什么南方文化世家特为兴盛?可联想屋顾炎武所说的“北方族性之衰”云云)、时代比较(明清世家大族与六朝隋唐相比有什么特点?一个趋于世俗化的社会,世家的新意义为何?等等)。从微观的史述来说,有待于深入到世家文化的内部去看,了解其是如何透过门风以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党援、交往、标榜、以风气相激励(如“易堂九子”等),以及因此而凝聚精神核心价值,塑造家族成员人格,形成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援助的良性机制,等等。对于世家的秘奥,或许我们有待于文化的深描:我想起钱宾四《八十忆双亲》里的一个场面:幼年钱穆于除夕之夜,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外出的哥哥回家吃年夜饭。两个弟弟依在母亲身旁,外面是香烟缭绕,爆竹喧腾,里面是无灯无火,钱穆与母亲、弟弟,静静守候着哥哥回家。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怀的深情,涵咏其中的是中国文化敦友睦亲的厚意和悠久而深长的日常情味。家族文学的研究若能深入描述,细节不弃,涵泳而体悟,